

1601

荟萃“三亲”史料

博览近代郑州

- 先君嵇文甫言行钩沉
- 杜孟模传略
- 郭晓棠传略
- 我的大伯父袁克定(再续)
- 回忆中州农民银行



# 郑州文史资料

1995年第2辑  
(总第18辑)

# 郑州文史资料

1995年第2辑

(总第18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封面设计:王顺利

郑州文史资料

1995年第2辑(总第18辑)

出版	郑州市政协文史 资料委员会	批准机关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地址	郑州市北二七路 76号	刊号	河南省内部 准印证第0064号
邮编	450000	印刷	郑州中丰信息公司 1995年12月

工本费 1.80元

## 目 录

### • 人物春秋 •

- 先君嵇文甫言行钩沉..... 嵇道之(1)  
杜孟模传略 ..... 杨中州(53)  
郭晓棠传略 ..... 张仁荣(67)

### • 名人轶事 •

- 我的大伯父袁克定(再续) ..... 袁家宾(84)  
从一张剧照想到的张伯驹先生 ..... 于 森(91)  
1902年袁世彤致袁世凯的两封信 ..... (94)

### • 说古道今 •

- 话说金水河 ..... 王均智(96)

### • 史苑觅踪 •

- 回忆中州农民银行..... 杨达口述 杨慧兰整理(102)

### • 古貌拾零 •

- 泰和典当铺访谈录..... 杨达口述 杨慧兰整理(113)

信成领当铺..... 杨 达(122)

### · 烽火年代 ·

在驻印缅远征军的几件事 .....

..... 李思恭口述侯炳立 整理(124)

红军战士路青松..... 李 江(130)

回忆“中原自治学院”..... 尹肇光(141)

一次不寻常的庆祝大会..... 张一麟(145)

日本投降后的郑州..... 陈兆新(147)

### 质疑·订正·补充

我所知道的张钫公馆..... 王永川(149)

质疑《张学良在郑州的指挥部》..... 崔景元(83)

# 先君嵇文甫言行钩沉

嵇道之

编者按：嵇文甫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且一生步于时代之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河南省副省长、郑州大学校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重要职务。他的著作文章，固为研究他的追求、信念、道德、治学、从政等方面的主要内容，而他的鲜为人知的日常言行，更可从细微处作为研究他生平的佐证和补充，且对人们具有广泛而生动的启迪之益。因此，在纪念嵇文甫先生诞辰 100 周年（1895—1995 年）之际，特发表由其子嵇道之先生撰写，经郑州大学杨中州教授编排的《先君嵇文甫言行钩沉》一文，以飨读者，并作为对嵇文甫先生的纪念。

## 序

先父讳明字文甫，以字行，自幼聪明睿智，博学强记，卓特不群。道德学问为世所倾服，盖非一朝一夕之功，非欺世盗名者所能比。其一生始终站在潮流之前者，以其谦虚谨慎，不断追求进步故也。先父之著述固为其思想学问之结晶，然尚有许多嘉言晶行，虽系片言只语，亦确乎为精金碎玉，足为后世

法而又不见其著述者，现追忆之，既为纪念，又传之后世，以为学习之楷模也。唐代史学家柳芳评房玄龄曰：“……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先父一生名高，识与不识皆赞誉之，以当其学生为荣，然究其具体事迹，皆不能道，虽较熟之人亦然，亦可谓之“无迹可寻”。我虽一生追随左右，然学识浅薄，对先父理解不够，现所追忆或为其不足道者，仅以此表寸心可耳。敬待先父学生中之学识高深者以补愚之不足。

年谱中所不便载者、日期不明者、属日常生活之事者，咸载于此。因时间久远，又加记忆衰退，仅就现在追忆所及敬记于此。又此文自1964年始记，中间间隔20余年，1988年7月又开始续记。

1988年9月

1940年，先父在潭头（嵩县潭头镇，时河南大学所在地）为我讲《庄子·养生主》，讲至“沿督以为经”时，说实际上道家也是叫人明白“中”，可是道家举例说“环中”“两行”等说得那么玄妙、神秘，而儒家却把“中”与“庸”相提并论，说的很平常，由此即可看出两家之高低。

我父亲是十分爱护青年的，他喜欢青年的朝气、向上、纯洁。他说和青年在一起不落后。他希望我们教书、和青年在一起。在这些方面我受他很大影响，我一直坚守教育岗位，一直相信青年，把自己的全副感情寄托在青年身上。另外，我弟兄虽皆碌碌，然还多少有上进之心。此亦为先父之影响。

我父亲曾向我说过，作文章有大题小做，有小题大做。后者如韩愈写的《毛颖传》。其他忘记了。

抗日时期在潭头，父亲曾向我说，有些旧书如“四书”，在中国的现社会中还常被引用，所以仍有学的必要，因而他给我讲过《论语》中孔子叫他的学生“各言尔志”那一章，又讲过孟子见梁惠王；至于《老子》、《庄子》则以其难懂，才给我讲的，宋、明哲学则只是偶而谈几句而未讲，以其无用也。

1938年夏，我家住在镇平石佛寺时，我在书店买了一本《马、恩论中国》，父亲曾看过，他说恩格斯在该书中说东方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往往是用投毒……等等方法来反抗，实际上这暗示出弱小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游击战术。落后的民族是不能用阵地战来对付强大的帝国主义的。

1936年先父为我讲《史记·滑稽列传》时，特别提出讲太史公说的“谈言微中，亦可以排难解纷。”

1938年，在镇平石佛寺时，先父说，读马列主义的书最初时他也不懂，后来找到一本普列汉诺夫著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开始读懂了。以后再读普列汉诺夫著的《史的一元论》就能深入下去了。所以他叫我照他的经验读。他又说，不一定开始就读大部头的原著，通俗易懂的书是对初学者有益处的。因而他早在1936年就给我卖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曹伯韩著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让我读。



在潭头时，他向我说干宝(令升)的《晋纪总论》是大手笔，很好。可是一般人只知其《搜神记》而已。

1947年我写了一篇《读夸饰》，先父又加上一个副标题《修辞管见》。后来和我谈起了修辞学问题，他认为《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很类似心理学中所说的“类似联想”和“接近联想”。因而启发我又写出了《谈比兴》，副标题就写为《修辞管见之二》。后又写出《谈映衬》及《谈修辞》。副标题皆为“修辞管见”。但后来把次序改了。《谈夸饰》倒改成《修辞管见之四》了。其实该文发表于1947年河南民国日报。这说明先父对《诗经》是有独到的见解的。

二十年代，杜子劲先生和先父在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同事，他知道杜先生语文教学有办法，而自己只能教学术文。1938年秋，先父特别把我带到杜先生处，专托杜先生教我。后来杜先生叫我先读一下莫泊桑的《项链》。过了两天我再去请教。杜先生叫我把该小说分成大段，我莫明其妙，杜先生替我分析。又问我莫泊桑在这篇小说中怎样表现对社会的认识。我仍然莫明其妙。杜先生便指出该小说最后一段给我讲解除，我才明白了。这在我是第一次受到分析文章的教育，从此我提高了一大步。这完全是我意想不到的。可重要的是从此影响了我自己的语文教学，我之所以尚能滥竽语文教师，完全由于杜先生的教导所致。这是我终生感谢的。

先父抗日战争以前至建国后即长期订阅《世界知识》。我

过去不爱读杂志，但抗战开始后就不得不注意时事。另外，先父也爱讲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因而对我很有影响。我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之所以较熟悉，一方面因为我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一方面也看了一些论世界时势及名人传记，但更重要的是先父给我的讲述。至今仍对二次大战有兴趣。

先父喜读《封神演义》，我记得我七岁初到开封时，往他在学校的寝室去玩，就曾见过书架上有《封神演义》，我听他给我说过哪吒出世的故事，因而我常拿起这套书，看其中的画。四十年代初在潭头、解放后在郑州，他说过该书写的“陆压道人”很有趣。我也读过两遍该书，知道该书是反暴君思想。明代的暴君很多，这部小说有反抗思想。他又说，该书中有融合释道思想的表现。

我父亲嗜好读书，但有时也唱歌，如抗战歌曲，他会唱《流亡三部曲》。也唱《大刀进行曲》。抗日战争前在北京教书时，他偶而唱几句京剧，偶而听一次京剧。他唱时都是小声，自己欣赏。

我父亲向我说：有些诗文宜于甜吟蜜咏，有些诗文宜于高声朗诵。古文和白话文一样。

我七岁自故乡到开封的那年，父亲曾说应锻炼身体，参加运动会，以后的中国是不平静的，没有好身体不行，应该学会骑马、爬山、游泳……

先父对于我们兄弟的教育方法，从不主观，很重视我们的志趣，绝不勉强，以我们弟兄的愚鲁，强迫也无用。如果志趣不明确，便设法买书诱导。他给我买文学、历史等通俗著作，连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也买给我看，《大众哲学》《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讲解故事或介绍古人名人事迹。比如家兄爱好音乐，他就送他去杭州艺专，上海音专学习，总算有一些成就，如不然则一事无成。他说他不用别人的教育法。再如我的次子立成在郑大电机系学习时，有一期有两门不及格，先父说，他上学早一点，不行了留级。并无任何责备之意。后立成的功课都及格了，现为大学副教授。

《世说新语》中曾经说某人的修养是“澄之不清，浊之不混”，对于先父我亦有此感。平时觉得他对事情是明白的，但偶然好象觉得他又有点不甚清楚。可是仔细想想，他仍然是非常明白的人。四弟亦有同感。

《论语》中颜回称赞孔子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我弟兄对父亲皆有此感。我记得小时读书，偶有心得，想着我父亲一定不会想到，但和他一谈，他比我知道的多而清楚。又过了多年，自己已有了大学水平，偶然有了一点点心得，觉得他一定不会知道，可是向他一说，他仍然原原本本地给我解说，比我知道得多，以后如此多次。平时觉得他见解非常高明，但有时听他说的道理并不高明，非常平常，而且说过多少次并不稀罕。我记得郭海长同志有一次在我家当面问我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回答是“谁也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极高明的见解”。

抗日战争前，在开封先父曾向我说：唐朝杨惠之原来也是学画的，但后来他觉得无论如何画方面的造诣也不会超过吴道之，于是便改行，专心学习塑像了，因而在历史上一提塑像便立刻会想到杨惠之。由他这段话，我感到他一生文章短小精悍、通俗幽默、深入浅出等独树一帜的风格，也可能与他的这一见解有关。后来又想到他狱中诗曾提到：“瓣香一峰二山”。全谢山是浙东学派的要人，而浙东学派最主要的特点是贵专家。全谢山一方面由于满清的文字狱政策，一方面浙东贵专家，所以他创造的以碑传序记等旧形式装爱国反清内容的新办法，来宣传爱国思想。这是独创的表现。先父学习他们的独创精神，文章风格，自成一派。大家称赞他的一些小论文，名之为哲学小品(文)史学小品(文)同时他也作到了全祖望淹贯的学识。

抗日战争前，先父曾经给我讲过马援的《戒兄子严教书》，因而我很注意自己，觉得自己才智很差，故从不妄想。

在潭头时，父亲批评我时曾说：王阳明批评他的大弟子王艮说，佛家认为一般人多犯“贪、嗔、痴”的毛病，故而以“戒、定、慧”来克服“贪、嗔、痴”。而王艮却与常人不同，故不能以对待一般人的办法来提高他。父亲进一步批评我，说我平正、心底好，没有一般人的毛病，因而也不能用纠正一般人的毛病的办法来纠正我。后又举东汉范滂的例子：范滂临刑时对他儿子说：“我若叫你为恶，恶不可为；叫你为善？我何曾作恶”？最后先父叫我不要过于认死理，过于认真。“贪的毛病我没

有，但犯“嗔、痴”病很重，过于信佛教大乘劝人不要执着“空”，实际治“痴”病。先父认为我弟兄皆不智，此则必以“慧”克服之。

先父曾经向我说，只要记住听党的话，团结群众这两条，就不至于犯错误。

约在1942年夏，河大在潭头时，一日他向我说：“也得学会耐闲！”至今我不太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那时大约是因为与外界隔绝，可能他觉得抗战时期应做的事太多，但却只在深山中教书，觉得有些“闲”。即在此时，他让我读陆放翁的《剑南诗钞》，并说，陆放翁的诗大略可分两大类，一类是闲适诗，一类是爱国诗，命我写陆放翁的爱国思想。可是我在读《剑南诗钞》时，对陆放翁的闲适诗，也很注意。可能此时先父觉得处境也和陆放翁一样，欲奋发报国而不能，处在闲适的环境而心不甘。当时我弄不懂陆放翁的这个矛盾思想是怎么会事，后来才逐渐体会出来，其实陆的爱国思想与闲适思想并不矛盾。这完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抗战时期在潭头，一日我提到唐朝狄仁杰，先父说：“他还了得！有旋转乾坤之力！是他毁了武则天的天下！”后又仔细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记载关于武后与狄仁杰的事，武后也很尊重狄梁公，从表面看不出他反对武后，只有记载狄梁公推荐张柬之给武后一事有关系。大概这就是后人对狄梁公有争议的地方。实际上，非之者非也。

先父常背诵胡适的“为学好比金字塔，既能博大又能高”两句诗给我及河大的学生。

先父时常在家中提到“迁就”。他很迁就人和事，过去我不了解，现在我才懂得这是很重要的处世态度与方法。

五十年代(约为1955年)我家住在郑大东生活区五号楼时，一日我为四子立功买一用玻璃制的玩具小汽车，其中装满小孩子吃的糖，既能吃又能玩，价格约一两角钱，很便宜，不是贵重东西。可是先父批评我不该尽想着这方面，精力没有用在正地方。他若是看到现在的青年人对孩子们的溺爱，恐怕会更生气。

我七八岁初至开封时，先父曾讲过一个小故事，至今未忘：一个农人牵一头牛到城里卖，后来空手回家了。妻子问牛呢？答换了个羊。又问羊呢？答换了个荷包(钱袋)。问荷包呢？答丢失了。妻子说人能回来就好。先父是以此故事来教育我们，要学习农人的妻子的好脾气，更不要随便埋怨人，不要要求人太高。

我记得先父曾两次谈到项梁初起兵反秦时给参加起兵的里人分配工作的事，当时有人觉得自己能力强想要较重要的位置，项梁不允许，并且说：过去里中某事你处理的不对，那人便不能不服气。现在想来，先父谈这件事，是叫平时即应注意人才，平时即应注意人之优缺点，以后才能善用其人。

记得我十五六岁时，家在开封龙虎街住，当时不知看了一篇什么名人的文章，我产生了疑问，不能解决，便问父亲：革命，是先自己修养学习好自身健全了才去革命呢？还是不管这些直接去革别人的命呢？先父说，只能一面自己修养学习，一面直接参加革命，在革命中学习提高自己。

先父说从三国演义上看，诸葛亮最得力的大将是赵云。我也有这种感觉。赵云勇敢忠贞，总是出色地完成任务。而且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不象关云长那样傲慢不听将令。

我上中学时，父亲常说：“不能当物质的奴隶。”追求物质享受，唯利是图，实际上都是当了物质的奴隶。精神享受倒是很重要的。他最好读书，从书中找乐趣。别人结婚，就我所知他都送给新人书，偶而也送礼钱。但是他读书又不是“玩物丧志”。他最反对教条式的死记硬背，及纯粹“玩物丧志”式的读书。

五十年代初，一日，先父向我说，现在不能象过去一样，要旗帜鲜明。

我从小到大，父亲总是教育说，要能抛去一切杂务，不去想，专心读书才好。此言过去我不懂，到现在我自己年老了，觉得岁月有限，才知道时间的可贵，所以更不愿管其他琐事及一切不必要管的事，我总想摆脱一切事而专心干自己的事。

我的联共党史知识及世界局势知识，多是父亲在家中闲

谈时得到的，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

自从1937年底，先君将所有私人书籍丢在开封租的屋子中，直至后来一生，全未埋怨什么。我想有几个原因：一、这些书他都读熟了记在脑中；二、可以说无贵重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木匣《二十四史》算是最贵重的了。他当时曾说过，抗日胜利了什么都有，不用怕。

抗日时期，先君向我说，有不少人，不愿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实际这些人都是有财产的人，放不下自己的财产。没有财产的人，就不是这种想法。现在想来这是阶级分析法。

大约是在五十年代中期，曾向我说了一句极重要的话：“个人向上爬，不是阶级斗争。”此话对我说，使我真认识了“阶级斗争”，胸中豁然开朗。如：在旧社会中有些读书人很穷，一旦考试中举，中状元，便阔起来，但只是他自己生活好了，而没再管被压迫的阶级兄弟，故只是个人向上爬；全国解放后，新中国的最初二十多年，仍然在和旧阶级残余作斗争，直到阶级消灭，当然不会再有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人民了。我们只有为人民服务。而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做到。

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时，父亲的面部气色变得成灰黑色。但他从未说过什么不满意的话，或是生法弄点吃的东西，家中完全按照国家供应吃。后来，张柏园副省长见到先父气色不好，特别为他订了一斤牛奶。



我的思想、学识,受父亲的影响最大。抗日期间,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亦是这样。记得他当时讥笑希特勒说:还是斯大林说的好,斯大林大约是在苏德战前说,希特勒不到苏联打共产党,而到奥地利和苏台区,捷克斯洛伐克;墨索里尼到非洲阿比西尼亚打共产党,真是可笑(大意是这样说)。英法德慕尼黑会议时,先父曾讥笑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外交路线的错误,后来证明果然张伯伦是错误的。我对西方政治的认识,完全受先父影响。

1964年7月20日去访三姨夫,他说我父亲小时和他同学但不同班,而他父亲在小学与中学皆曾教过我父亲。姨夫说我父亲在小学时和大家一样读“四书”,但读后能讲,教师不在时为同学讲解,而且是背着讲。旁人只会正文,他却连小字注解也会讲。这是很特殊的一点。

先慈在潭头时,有时因事不顺心而发脾气,先父总是好说:“都怨日本小鬼!”以解先慈之不快。

先父因为自己的字写的太差,所以很少为人题字。殁先祖父那一年春节,我们家乡和其他地方一样,时兴写门对联,他不写,叫我写,他也不自编对联,只是背些唐诗中的对偶句或流行的对联让我写。

五十年代末,先父买了一个袒胸露腹嘻笑颜开的小弥勒佛坐像放在自己的书桌上,我想他是喜弥勒的胸怀宽广。